编者按:2011年,著名作家池莉曾在“夜光杯”开设专栏“冷眼热心”,以清醒犀利的文字观照世相人心,深受读者欢迎。时隔五年,“冷眼热心”重返“夜光杯”,作家将与读者分享这些年来的新思考和新观察。

夜雨埋愁别书房

池 莉

清明节午夜,暴雨陡起,吓醒我于恶梦,书房漏雨了!这次不再是渗漏,是书房墙体开裂,暴雨从屋顶灌下,直接高山流水。我这栋所谓的别墅,典型是经济活动爆发时代花哨产物,只名字豪华、实质墙体菲薄,粗制滥造。此一刻,整面墙的书柜倾斜,上下几十扇柜门嘎嘎作响龇牙咧嘴,好像几千册书籍都在喊疼,我应激反应上来了,顿时楼上楼下利索奔跑,做到了以平时体力根本做不到的抗洪救灾。室内雨滴渐渐稀落,人却再难入睡,听着错落的叮咚声,感怀雅旧,恍若隔生。这总面积超过130平方米的书房与几千册藏书,曾是我人生的美梦成真。

年轻时我曾有梦:我要有一间自己的书房!

17岁我离家远行,身无分文,前途渺茫,网兜里只一洗脸盆和洗漱用具,挎包里却很富有地装了好几本书,其中宋词是我用唯一的羊毛衫换来的,唐诗三百首是我整个高中期间的早餐费。普希金诗集,是我偷用医院病历纸,一字一句手抄的装订本。我暗暗发誓:一定要为我的这些来之不易的宝贝,获得一间书房。追求开始了,一个埋头奋斗,就是30多年,书房越换越大,书柜越来越多,直至2003年年底,这带着前后大阳台的两间大书房,终于落成。终于,人生有了这么一天,在书房闲翻,在阳台捧读,一边沏绿茶,一边燃沉香,满屋子书香氤氲,竟以为自己这就算坐拥书城了。梦想随之膨胀:书房是否要更大?变成书阁或书楼?藏书量得过万了,善本书得弄几种了,得陈设画案配上砚台毛笔文房四宝了,得习字诵经了,得题匾绣名了。

2009年我住校香港大学,得知几位老教授的藏书,收藏着到最后,也是家里装不下了,捐赠图书馆还须慢慢排队。教授们合伙租用了山洞仓库,暂时存放藏书,其间还得请人定期护理。忽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地球只有一个,空间必有局限;个人藏书量越大,去向问题越严峻。同时另一个道理,也分明摆在我眼前:当空间无法改变,思维必须改变。现在已是高科技时代,再多书籍,也就是一枚小小芯片。后一个道理,自然来自于港大图书馆的体验。

港大图书馆令我耳目一新,图书馆藏书海量,设施一应俱全,电脑机器们随时提供使用,你需要资料都可以下载发送扫描复印。办证超级简便,只须你过一个面部扫描,证件立等可取。及至2014年在美国IOWA大学写作三个月,完全被图书馆颠覆。例如还书,随时随地,只要将书投入图书馆外墙上的一个入口,邮筒式的,便已完成归还。

原来,藏书这一桩雅事,早在我开始藏书的时候,其实已是一桩难事。世事变迁,社会进步,游戏改辙,如今还只有我这里,屋漏更寒,美梦尴尬,这个清明节,注定我要哀悼自己书房了。自古腐儒塞天地,人不明达即顽石,看来我正是顽石一枚。如果17岁就是一个明达的,就不会有后来几十年的徒劳辛苦。书房面积再大,还大得过人的心房?!

2016年4月15日 汉口

三十年前沪上莎剧节

(美) 海 龙

今年是莎翁去世40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使我想起了30多年前在上海的往事。

1984年,中国在上海戏剧学院成立了莎士比亚学会。此前,每当国际莎士比亚协会开会,我国只能通过外交部派观察员旁听。

中国莎学会成立不久,就开始承办一件大事:要在1986年莎士比亚去世370年祭的时候在中国举办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上海和全国有关学者和表演艺术家倾情投入,到1986年初已颇具规模。其时北京学界也风闻消息,认为全国莎剧节该在北京举办。当时担任全国莎学会主席的曹禺先生经过协调,决定将莎剧节在京沪两地同时举行:一场盛会,两个会场。

笔者躬逢其盛,当时正在沪上读研究生,有幸参与并观摩了莎剧节的大部分活动和演出,至今忆来仍然感念和激动。

那时人们办事非常心齐,又加上趁改革开放东风、各级领导支持,短时间内全国文艺团体和相关机构居然排演了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据考,莎翁一生写了36部半剧本,一般国家莎剧节也就是六七台戏演出,但那次我们竟是满堂红。这次莎剧节由于上海准备良久和酝酿较早,可以说是执莎剧节之牛耳,在全国独领风骚。除了演出莎剧,还进行了大量研究莎士比亚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上戏的学生,读莎剧、演莎剧、讨论莎剧和研究莎剧成风。得风气之先,它成了建国后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据统计,那时仅在沪上就演出了20余场莎剧。而全国的莎剧演出更是比英国当年多出了十几部。那时演出的剧种也是盛况空前。作为沪上举办地的主会场就在上戏。上戏当然要格外卖力,排演了莎剧中场面最宏大、人物最多和情节最惨烈的历史剧《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此剧是莎翁所写的第一部剧本,是复仇剧。曾在英国很受欢迎,但是其后几个世纪不太上演,上戏的师生复活了这个剧,引起了空前轰动。

那时非常亮眼的是除了话剧,上海莎剧节上还有大量的将莎剧移植成中国地方戏的演出尝试。上海越剧院演出了越剧《第十二夜》,同时上演的还有另一台越剧《冬天的故事》。上海还演出了将《麦克白》改编成昆曲的《血手印》。还有外地剧团带来的京剧《奥赛罗》。最值得一提的是黄梅戏《无事生非》,国际莎协主席认真观看了这部戏,笔者也参与其中。莎协主席关心的是莎士比亚国际化的成功之类大题目;而我震惊却的是当年马兰的青春亮丽和星眼流盼——当年的马兰使我理解了古人写美人的形容词并不是套话。除此之外,我印象最深的还有焦晃和李媛媛的《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将这部古代惨烈的爱与背叛的故事诠释得淋漓尽致。李默然带辽艺赴沪演出的《李尔王》,如黄钟大吕般撼动人心。

据统计,上海当年除了上面提及的,还有木偶戏、广播剧等八个剧种和各种形式的莎剧轮番上演,让中国人大大地过了一把莎剧瘾。临结束,国际莎协主席高兴地说他观摩了20多场演出,盛赞中国对莎翁的重视无出其右。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专门发来贺电。

莎剧节从4月10日到23日历时十四天,在莎翁生日也是忌日当天落幕。我记得闭幕式上曹禺讲了话,国际莎学会长勃洛克班克热情洋溢地盛赞了此次活动。闭幕式由上戏院长余秋雨主持。只是有趣的是,那年马兰和黄梅戏团演出的是《无事生非》,而此后发生的余秋雨和马兰之间新才子佳人故事恰恰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终成眷属》才对。

抗抗和老谢

修晓林

我与张抗抗见面的次数不多,算起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基本是十年一次,而每次见面的缘由,都是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著名编辑谢泉铭先生有关。老谢生前曾是我和她相识的纽带,老谢身后,我和张抗抗的友谊更因老谢而延续至今。

1986年秋,老谢知道我要到北京组稿,就对我说:“到了北京,代我去看看抗抗,向她问好。”在那所大学校园家属区的单元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抗抗。那一年,她只有三十六岁,经历了北大荒知青岁月初学写作的艰苦岁月,开始走上了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坦途。

1995年2月10日,上海的三十余位作家举行“谢谢老谢”文学活动,我们如众星拱月般围绕在谢泉铭先生的四周,以这种特有的方式,向我们的文学启蒙指导老师表达感恩之情。张抗抗专程由北京到上海参加这个活动。她站在会场当中说:“那时候的业余作者,四面是墙,两眼抹黑,总觉得走投无路。尚不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老谢的编辑。老谢的目光穿过堆积如山的来稿,老鹰一般犀利地挑选出哪怕有一丝修改价值的原稿。他搀扶着你引领着你,带你走出稚嫩走出茫然,将你送上那条艰辛又神圣的文学之路。”她的发言,激起同场作家友人的掌声。

2006年12月,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张抗抗在此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会议期间,我见到她,情不自禁地说:“老谢要是知道您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一定会特别高兴。”抗抗点点头,欲言又止。或许在她看来,老谢不一定很看重这样的职务吧?老谢看重的是稿子和作品。我也随她沉入深深的怀想之中——1974年,上海绍兴路54号大院的出版社小楼,是谁在那儿苦苦地写作和追寻?如今在文坛无人不知、谁人不晓的张抗抗,在那个忧郁沉重的七十年代,张抗抗多么希望有人对自己的写作做出切实的指点和帮助!这个人出现了,谢泉铭老师在仔细审读了张抗抗的长篇处女作《分界线》之后,对她的初稿加以了肯定,并亲自和边疆农场交涉为她请了“创作假”,邀请她来上海修改作品。在上海出版社小楼的办公室里,师生间面对面的亲切恳谈和真挚交流,成为点燃张抗抗心中理想和希望的温暖火种。被张抗抗称为“训导主任”的老谢,一旦讨论稿件,立马变得严肃而苛刻,不仅是作品的结构、人物塑造,连错别字、语法、细节、人物对话的语气都一一斟酌过滤。张抗抗至今记得,老谢曾为她找来上海和全国粮票,细心安排她的食宿;周日还把她和叶辛接到家里,亲自下厨为他们改善伙食……此时,在抗抗的宁静思念中,该是凝聚了多少对于往日时光的感慨。

2011年6月,我策划、组稿并编辑《谢谢老谢——深情怀念谢泉铭》怀念文集。张抗抗在本书的纪念文章里写道:“老谢离去十年,还有那么多文友怀念他,祭奠他,但愿老谢在天之灵,会有感知和慰藉。”她还对我说:“等我下次去上海,你陪我去青浦福寿园看望老谢好吗?”一次,抗抗在电邮中写下怀念老谢的文字之后,附上《月光奏鸣曲》。我马上打开这个附件,再一次聆听贝多芬的这首名曲。在我听来,由钢琴键盘缓缓流淌出的,是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对于当年艰苦成长道路的沉思和回忆,是叹息的主题,也是憧憬的甜梦。

以前,老谢称呼张抗抗为“抗抗”,张抗抗也只有在给前辈编辑老谢、任大霖、陈向明等的信件和电话中,才称自己是“抗抗”。现在,老谢早已不在了,张抗抗仍是很自然地对我说她是“抗抗”,我在电话和短信中,也是那么随意地称呼她“抗抗”,其中,自有我们共同的对于谢泉铭先生的思念。这是一种深切的情感转换,更是一种文学精神的传承。

仅是这一声,已是自家人。

万家灯火父母心

邱慧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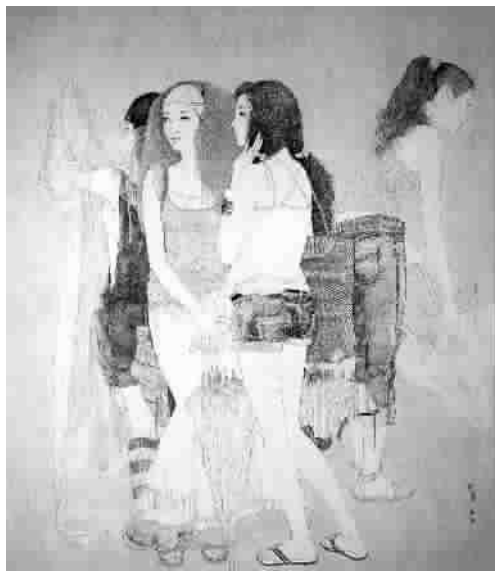
和同事一起游完千灯古镇,等车回家,又遇见来时同路的老伯。来时,在安亭地铁站,老伯热心地告诉我们,可以乘227路免费短驳车,到昆山花桥公交枢纽站,换乘253路到千灯。他特别补充一句:“有交通卡,车钿只要6角。”6角,对本来打算叫出租车的我们来说,太便宜,太有诱惑力了。

这时,老伯又在与路人攀谈他的出行经验。于是,我们知道从上海到苏州游玩,不坐火车而利用交通卡的公交换乘,可以省下不少车钱。“依经常来千灯?”我们问。老伯答:“是啊,现在的小囡结婚要求高,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婚房。阿拉的老房子是学区房,卖给一对小夫妻,伊拉要给小囡报户口读书用,这钞票就拼拼凑凑买了两套房子,上海的一套给儿子结婚用,老夫妻俩反正退休了,等儿子结婚了阿拉就住到千灯来。”淡定的语气,没有抱怨,有的是心安,有的是轻松。

在“中国式买房”的后面,尽管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需求结构和不同的生活状态……相同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在楼梯里上下往返为人装修运送黄沙水泥的挑夫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看到他挥汗如雨,问及累否?他笑答:“累!”并告知天天挑。惊讶他重负之下的开心,于是知道他来上海5年,靠做苦力赚到了50万元,还清了老家20万元的债务,余下的钱攒起来准备给已在上海工作的儿子买房。言谈之间,他的手机响了,活儿又接到了。还有一个油漆工告诉我,有活干,可日入三五百,这些年赚到的钱都给儿子在北京买房用了,他自己则在租来的房中蜗居度日。

高昂的房价牵扯太多的问题,“中国式父母”顾不上彷徨犹豫、怨天尤人,用最原始、最简单的肩挑手提,克勤克俭,来为子女添砖加瓦。真是可怜的父母,幸福的子女!

想起在古镇的千灯馆里看到这样一段话:“灯乃光明之象征,万家灯火,是千灯的理想……”愿那位老伯在千灯古镇点的这一盏灯,能吸引他的儿子常回家看看。



甘霖 (中国画) 罗寒蕾

一只陶瓷大公鸡

琪 琪

在我家书房的大书柜里,存放着一只陶瓷储蓄罐大公鸡,说起这只陶瓷大公鸡,还得追溯到三十多年前,我跟老公谈恋爱的那段时光。

三十多年前,我和老公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同班同学。入校一年,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之后在校园里我俩同进同出、形影不离,俨然成了一对热恋中人。那年暑假,我俩商议着要和同学们一起去青岛游玩,但他母亲不同意,那时经济条件都不好,长辈们不舍得乱花游玩的钱,于是我只能和同学们一同去往青岛。在青岛的小摊上,我见到很好玩的陶瓷大公鸡,就买回来作为礼物送给了恋人,这也是我第一次送给他定情物。

那时我家和他家相隔六里路,暑假分开时,抒发交流情感就完全依赖情书信件。每隔两三天,我就会收到他的来信。相恋三年里,我们的情书摞起来足有一尺半高,遗憾的是,我们共搬过三次家,不知何时,就把那一摞情书给弄丢了,仅有一封信还留存在我的日记本里。正是那年暑假,我送给他“大公鸡”后,他非常开心喜欢,第二天我就收到他的来信,他的开头总是这样写着:“最亲爱的琪:你好!非常谢谢你送我的大公鸡,我把它搁在我书桌前的窗台上,每每看到它,我就会想你,好想时时刻刻你能像它那样陪伴在我身边。你去青岛的七天,恍如半世,真可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多希望能天天看到你美丽的倩影。”

“我好喜欢你千里迢迢带来的这只褐黄色的大公鸡,它高昂的头,张大的嘴,气宇轩昂,挺拔威武之势,让我振作又振奋。你去青岛那几天,我心神不定,没劲又无趣,我的魂魄仿佛也随你去了青岛,整日无精打彩,浑浑噩噩,直至今天,看着公鸡安静地挺立窗台,我的心也定定的,舒畅的,安详的,仿佛看到你也在定定地端详着我。我今天才开始做着一件重要的事,我要向你汇报:我找出了珍藏的心爱集邮册,一张张地重新整理了一遍,整整花去了我一天时间。吃了晚饭,我就迫不及待地给你写信了,我又在想你了,我想立即把归集好的邮册给你欣赏,并听我讲述这些邮票上的故事,我想你一定会喜欢听和喜欢我的邮册。

月亮已爬上半空,白白的月光透过窗帘洒在了大公鸡身上,公鸡也睡觉了,我也要收笔了——再见!——爱你想你的洪。”

想当初,没有电话,没有BP机,没有手机,爱人的思恋和牵挂之情,就体现在一封封书信里,这封仅存的情书记载着我们青春年华的青涩爱情、美好情愫。

如今的手机微信、电脑伊妹儿,传递情感快捷、便利、直接,而我们那时情书写作时的用功、用心、勤力,更多了份厚重、细腻,见证了我们深沉的炽热情爱,也更有着刻骨铭心的绵长回味。

十日谈

情书

代写情书成月老,请看明日本栏。